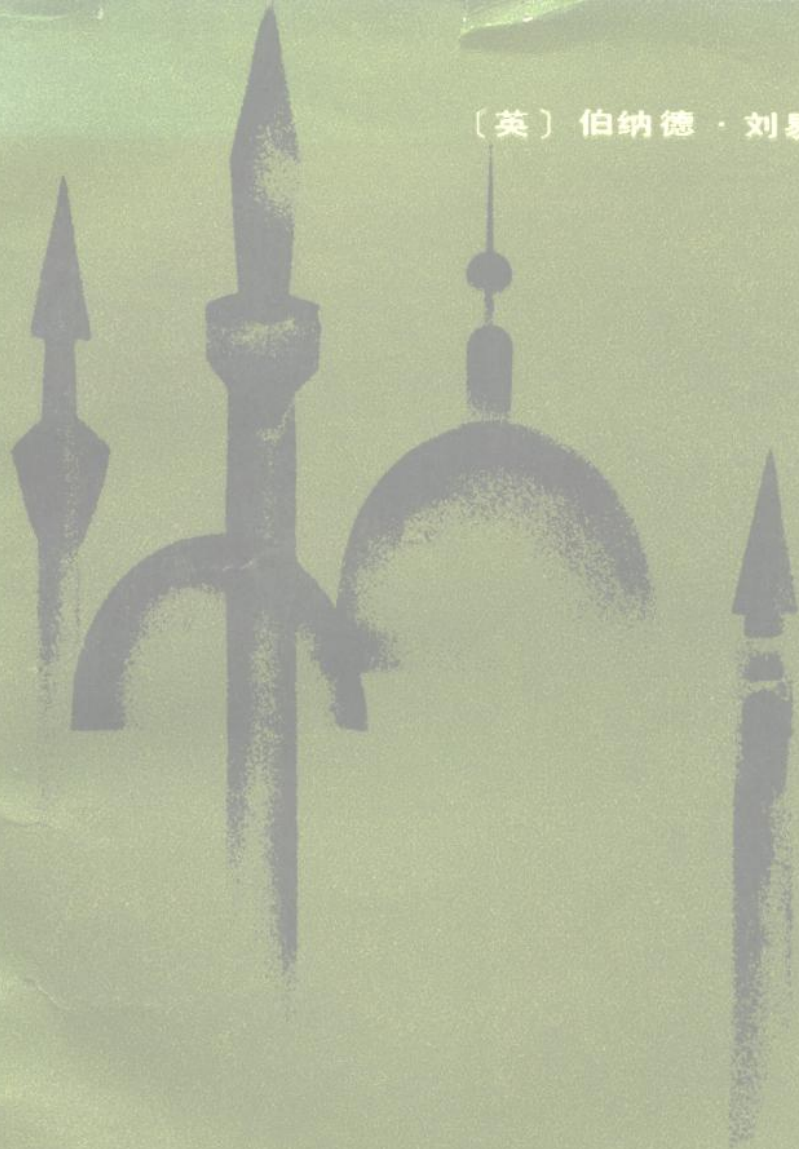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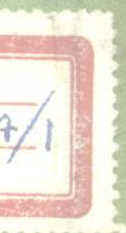


〔英〕伯纳德·刘易斯著



现代土耳其的兴起



K374.4/1

现代土耳其的兴起

[英] 伯纳德·刘易斯 著

范中廉 译



20846364



商务印书馆

1982年·北京

846364

Bernard Lewis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
SECON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68
根据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 1968 年版译出

现代土耳其的兴起
〔英〕伯纳德·刘易斯 著
范 中 廉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 11017·518

1982 年 2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2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538 千
印数 1—2,750 册	印张 19 1/2。插页 1
定价: 2.50 元	

向

吉尔和埃尔居门特表达

友谊和感激之情

目 录

第二版前言.....	3
前 言.....	4
致 谢.....	6
第 一 章 绪论:土耳其文明的由来	7

第一编 兴起的各个阶段

第 二 章 奥斯曼帝国的衰落.....	27
第 三 章 西方的影响.....	47
第 四 章 奥斯曼的改革.....	81
第 五 章 革命的种子.....	137
第 六 章 专制和开明.....	185
第 七 章 同盟与进步.....	222
第 八 章 基马尔主义共和国.....	250
第 九 章 基马尔以后的共和国.....	309

第二编 各个方面的变化

第 十 章 社会与民族.....	337
第十一章 国家与政府.....	382
第十二章 宗教与文化.....	422
第十三章 社会上层与各阶级.....	467
第十四章 结论:土耳其革命	506
注 释.....	516

索 引.....	589
地 图.....	619
后 记.....	620

第二版前言

本书第一版是在 1960 年付印的。从那时起,许多新资料又已披露,重要的文件和专著已经得到发表或经过核查,许多关于现代土耳其历史与思想的研究和专题论文已可在土耳其和其它国家见到。在本书连续各次的重印中曾经作了一些小的改动。出版一个新版,提供了比较大幅度修订的机会。然而由于结构上的和实际方面的理由,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限制,在这种限度之内,我曾经设法从后来历史的和历史编纂学的发展所提供的更广大的视野和更深邃的见地中获得益处。我曾经改正了一些事实的和判断的错误,补充了一些遗漏,更改了和添加了若干问题和事件。参考书目经过重新选定,一直编排到最近为止。

B. 刘易斯

1967 年 5 月于伦敦

前 言

本书的主题是，一个新土耳其是怎样从旧土耳其的废墟上出现的。在绪论部分对于土耳其文化来源及性质作了分析之后，全书分为两部分。在第一部分中，主要事件及经过均按年代先后排列，但又并不是把这些编写为一部简短的叙述性的土耳其史，而是设法探索并划定其中各个主要的变化阶段。在时间上，本书一直叙述到1950年为止，即在那一年，阿塔图克的党在一次由它主持举行的自由选举中被赶下了台，从而使这个国家进入了一个历史的新阶段。本书第二部分就四个不同方面的变化作了较详细的分析——土耳其人在法人团体观念和忠诚观念方面的变化，有关政府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变化，在其控制下的宗教与文化生活的变化，以及经济与社会秩序的变化。最后一章试图就土耳其革命的性质及其完成的程度，作出一些一般性的结论。

在另外一篇短文中，我对那些在为本书的编写曾经给予这样或那样帮助的各方人士谨致了谢忱和敬意。这里，我愿向两位学者表示我的衷心铭感，他们两位都和本书直接无关，不过，如果这部书尚有任何可取之处，那么，大部分也就是他们二位的贡献。第一位是我的朋友和同事维特克教授，通过多年来和他的交谈，使我在充实自己对于土耳其历史及文明的了解方面获益之深，实非任何郑重对他这种帮助和指导提出的谢意所能表达的。第二位是深为令人惋惜的已故的阿德纳·阿迪瓦尔博士，正是由于他的影响和教导，才使我第一次对于土耳其和土耳其人有所认识，才使我第一次得到了关于土耳其语和土耳其文学的知识，使我对它们保持了

经久不懈的关注,这种关注从此一直在影响着我的一生。

B. 刘易斯

1960年1月于伦敦

致 谢

我衷心感谢伊丽莎白·门罗女士、汉米尔顿·吉布爵士教授、A. T. 哈托教授、P. M. 霍尔特教授、A. H. 侯拉尼先生、J. C. 休勒瓦茨教授和 D. A. 罗斯托教授，他们仔细阅读了我的部分或全部手稿，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E. 阿塔贝博士，他为本书摄制了照片，并在编写本书的整个期间给予了帮助和支持；H. 奥利弗女士，她为本书准备付印提供的帮助是十分细致和非常可贵的；D. A. 罗斯托教授，他对一组校样进行了审阅和校正；已故 D. E. 皮彻先生，他为本书绘制了地图；M. 莫伊尔女士，她编制了索引；弗朗兹·泰施纳教授（曾主编 *Alt-Stambuler Hof- und Volksleben*, Hanover 1925）、托普卡珀·萨拉耶博物馆馆长以及《哈亚特》（*Hayat*）的编辑，他们都非常慷慨地准许本书复制了他们的插图。本书的某些部分是以过去曾经发表过的文章作为依据的，为此，我十分感谢 G. E. 冯·格伦鲍姆教授和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曾主编和发行 *Unity and Variety in Muslim Civilization*, Chicago 1955），以及《世界史杂志》、《中东事务》、《国际事务》、《伊斯兰大百科全书》和《伊斯兰研究》的各位编辑先生准许我这样做。最后，我还应感谢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它为我 1954 年至 1959 年间去土耳其旅行捐助了旅费，并且在本书的准备过程中，给予了帮助和鼓励。

在为本书再版进行准备工作期间，我从不少期刊上的书评作家们的评论中获得了教益。我愿向他们表达我内心的喜悦。我还对下列诸位通过私人书信提出的评论和建议深表谢意，他们是：F. 艾哈迈德博士、Y. H. 贝尤尔教授、R. H. 戴维逊教授、U. 希德教授、F. 伊兹教授和 E. 库兰教授、H. A. 里德博士、D. A. 罗斯托教授以及 M. E. 亚普博士。

第一章 绪论：土耳其文明的由来

什么时候曾经有过那样才华盖世的人，竟能写出土耳其人的智、勇与坚韧不拔呢？像过去的阿拉伯人、萨拉森人和亚美尼亚人，叙利亚人和希腊人一个个在他们面前发抖一样，如今法兰克人也被他们的箭吓得望风而逃。

法兰西叙事诗，1100 年左右

君士坦丁堡的怪事之一是，人们只要花上一个铜钱，便可以坐着渡船，由鲁米利亚到法兰基斯坦，或是由法兰基斯坦到鲁米利亚。

特桑·贝格，1500 年左右

“土耳其人是说土耳其语和住在土耳其的一种人。”乍一看来，这似乎不是任何一种突出独创的说法，也不是任何一种具有很革命的内容的说法。然而，这种思想之能够在土耳其得到采用并且加以传播，终于被土耳其人民接受下来，用以表明他们作为法人团体和国家的性质，这也就成了现代的一次主要革命，从而与过去的社会、文化与政治传统实行了断然而急剧的决裂。

几乎远自十一世纪土耳其人最初征服安纳托利亚那个时候起，欧洲人^①便一直把这块说土耳其语的地方称作土耳其。然而，土耳其人自己却直到 1923 年才采纳了这个名称作为他们国家的正式称号。从当时他们采用的 Türkiye 这一字体，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字的欧洲本源。这个民族曾经一度把自己称作土耳其人

(Turks),他们所说的语言始终被叫做土耳其语 (Turkish)。但是,在奥斯曼帝国社会中,土耳其这一种族名称几乎已不再有人使用;而以后在用到这一名称时,主要又含有鄙视之意,即系指游牧的土库曼人,或在更晚一个时期,系指安纳托利亚乡村中说土耳其语的粗鲁无知的农民而言的。如果拿它来称呼一个君士坦丁堡的上等²人,那就无异是一种侮辱。^②

甚至奥斯曼这一名称,也象伍麦叶、阿拔斯和塞尔柱等一类词那样,是根据它作为一个朝代的意义,而不是根据它作为一种民族的意义来理解的,而奥斯曼国家被认为是直接承袭和接替了过去的伊斯兰大帝国而来的。至于作为集中表现民族忠诚感和爱国心的如像奥斯曼民族和奥斯曼祖国等一类的概念,那是在十九世纪受到欧洲影响之后的产物。而这类概念存在的时间又都是很短促的。

截至十九世纪为止,土耳其人一向是把自己主要作为穆斯林来看待的;他们的忠诚,根据不同阶层的不同情况,分别属于伊斯兰教、奥斯曼王室和奥斯曼国家。一个人所说的语言,他所居住的地区,以及他自称是某某后裔的那个种族,可能都具有个人的、情感上的和社会的意义。这些全都与政治无关。土耳其人曾经如此地把自己和伊斯兰教完全等同起来,以致使得土耳其民族这一概念无法显露出来——虽然土耳其语是保存下来了,同时土耳其这个国家即使不在理论上却也在事实上是存在着的。在普通老百姓,即庄稼人和游牧民中间,一种土耳其意识感保存了下来,并通过丰富多彩的却不受重视的民间文学得到了表现。然而统治集团和知识界在意识到自己是伊斯兰教其中的一个单独的种族和单独的文化个体这一点上,他们甚至比阿拉伯人和波斯人还不如。

就现代意义而言的土耳其民族这一概念,首先出现于十九世纪中叶。许多因素促成了这一概念的发展,如:流亡于土耳其的欧

洲人,和流亡到欧洲去的土耳其人的作用;欧洲方面关于土耳其学的研究及其所获得的有关土耳其各族人民的古代历史与文化的新知识;居住在俄国境内的土耳其人和鞑靼人,他们遭遇到俄罗斯的大斯拉夫主义,便以他们自己日益增长的民族意识感来进行反抗,而说来十分令人大惑不解的是,他们却由从事土耳其学研究的俄国人的新发现中获得了教益;还有,奥斯曼帝国统治下各个附属民族的影响,由于他们是基督徒,因此比较更加容易接受那些来自西方的种种民族观念,随后他们又把这类西方的感染及时地传给了³他们的帝国主子。

最初,这些观念仅限于少数知识界人士,后来逐渐散布得更广更远,等到第一次采用土耳其和土耳其人作为这个共和国及其人民的正式称号时,这就标志了这类概念的最后胜利。这种对于土耳其共性的感情的滋长,是和疏远伊斯兰教的习惯与传统并转而倾向于欧洲的这一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开始的时候,这种运动只是推行各项纯实际性的短期改革措施,要达到的目的也是有限的,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有意识的行动,为的是使全国都由一种文明领域进入另一种文明领域。

在奠定了民族运动和现代化运动的基础之后,随着出现了一种有趣的新发展,那就是,竭力设法证明土耳其人和在他以前就已存在的早期本土文明乃是同出一源的这一说法。这种情况也同样发生于其他一些伊斯兰国家,而这自然又是由于受到从欧洲传入的一些概念影响的结果,如认为祖国的意义不在于宗教,而在于领土,认为在人和他所定居的那块土地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思议的永恒关系等。这样,在土耳其便出现了所谓安纳托利亚运动,以及由阿塔图克所创立的关于苏美尔人、特洛伊人,尤其是关于喜特人等古代民族^③原系土耳其人的种种学说。

这个运动是带有一部分政治作用的,其目的在于鼓励土耳其

人能够使自己和他们居住的那个国家互相一致起来——因此同时也有防止不让他们走上泛都兰主义危险道路的作用。尽管由于政治上的作用，阿塔图克的安纳托利亚学说未免带有夸张和荒谬的地方，然而其中却依然包含或者可以说还揭示了某些不失为重要真理的部分。

我们从而可以分清现代土耳其所由形成的三股主流，即伊斯兰的源流、土耳其的源流，以及第三，由于找不到一个更好的名称，不妨笼统地称之为地方性的源流。

一、地方性的源流

移居到土耳其来的穆斯林土耳其人的一个特点是，他们有一种错综复杂而多样化的文化与传统。安纳托利亚式的文化与传统便是其中之一；它的重要性曾经是土耳其官方学说所特别着重强调的。在这方面，喜特人变成了宣扬最力的一项学说中的中心人物，他们曾经留下了最为生动的遗迹。安纳托利亚的其他各古代民族无疑也都留下了他们的痕迹。然而，安纳托利亚式的文化与传统并非穆斯林土耳其人仅有的一项特点。奥斯曼帝国自从最初成立的那个世纪起，便既是一个安纳托利亚国家，也是一个巴尔干国家，而鲁米利亚长期以来又一直是帝国的主要中心，只是到了我们的时代，鲁米利亚才连同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一道失去了它们的中心地位。那个都城亘古以来就是帝国欧亚领土间的桥梁，具有千年之久的国家与文明的传统。

任何一位外地来客，尤其当他是由南边或者东边进入土耳其的，一定会立刻发觉到土耳其伊斯兰文明中所保存的地方性传统是多么的强烈。许许多多的东西都会引起他的注意，如象安纳托利亚乡村房屋与寺院的式样和结构是多么不同于叙利亚和伊拉克乡间的房屋与寺院；土耳其的所谓流行歌曲中的巴尔干式或几乎

近于欧洲式的音调，是多么迥然不同于波斯—阿拉伯式的“古典”音乐；清真寺的拜占廷式圆屋顶，以及正规图案中和农村手工艺品中的希腊式和东南欧式的装饰图样等等。

现代土耳其还保留着安纳托利亚成分，这一点是无庸争议的。没有必要硬把今天的土耳其人说成就是喜特人，或是硬把过去的喜特人说成就是土耳其人——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他们彼此之间曾经有过很大程度的连续性。这种情况，由于目前在安纳托利亚同时进行的考古学和人类学工作所取得的进展，而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诚然，土耳其人曾经向安纳托利亚进行过大规模的移民，但是，当地原有的居民并未因此而被消灭掉，或被通通驱逐掉。遭到排除的是以希腊人为代表的那个上层阶级和以崇尚希腊为内容的那个文化阶层——在这以后，当地居民方才慢慢地再度受到同化，而这次他们却是按照伊斯兰的和土耳其的形式被同化了。他们仍然保存了不少他们自己的文化，特别是有关农业和农村生活方面的，例如：季节的交替，播种和收割，以及生育、结婚、死亡等。新输入的伊斯兰文化，无论是对于这里或者任何其它地方来说，主要是属于城市范围内的东西，因此它和上述乡村事物的关系是比较少的。

鲁米利亚的影响，自从土耳其人征服该地以来，与其说是来自下面，不如说是来自上面。和安纳托利亚的情况不同，鲁米利亚绝大部分地区从来就没有被同化而接受伊斯兰教或是采用土耳其语。农民大众信奉的仍然是基督教，他们不仅在宗教上而且还在语言上和文化上把自己变成了外国人，从而使自己置身于土耳其人的文化领域之外。但是，巴尔干的各个民族对于奥斯曼统治阶5级却有着极大的影响。发生影响的最重要途径之一，便是“代弗希尔梅”(devşirme)，即少年征役制^④，无数的巴尔干基督徒全都是通过这一途径进入帝国的政治和军事上层的。不仅如此，就连当地

基督徒中的地主阶级也并不象大家所想的那样已经完全被推翻，而是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地在他们原有的土地上保存了下来，并且成为奥斯曼制度中的一部分。直到十五世纪的时候，在阿尔巴尼亚仍然可以找到基督徒的蒂马里奥特(Timariots)——军事采邑主^⑤。在那时以及后来，鲁米利亚以基督徒组成的军队，便和奥斯曼的武装部队并肩作战，其中有的编为封建骑兵，有的充任普通步兵；而在帝国的亚洲各省，到处都可找到领有军事采邑和统帅着军队的改信了伊斯兰教的鲁米利亚人。奥斯曼帝国时代的阿尔巴尼亚人和波斯尼亚人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是人所共知的。他们后来还同其他的鲁米利亚人一道，继续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改革运动和革命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土耳其从拜占廷继承下来的遗产，一度被过分地夸大了。有些历史学家几乎把奥斯曼国家和奥斯曼社会的每一件事都追溯到这个或那个拜占廷的来源上去，并且还说大规模地模仿拜占廷的各项制度和做法，是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后开始的。如今，一般都认为这类说法大多是错误的，并且认为奥斯曼文明中带有拜占廷成分实际要比原来想象的少得多。另外，所有这些拜占廷成分又都是君士坦丁堡未被征服以前便已出现了的，其中多数甚至是发生于奥斯曼国家尚未建立的时候。某些模仿事例可以回溯到安纳托利亚的塞尔柱人时代，有的甚至可以追溯到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帝国时代。那时它们被作为正宗的伊斯兰文明的一部分而传到了土耳其。对于塞尔柱人来说，由于他们曾经长时期和拜占廷人相处在一起，因此发生模仿的事也是很自然的，而那时他们的国家也还没有变得象后来奥斯曼人看到他们时那样一副相形见绌的模样。^⑥

- 6 如果说土耳其文化中的拜占廷成分被夸大了，年代被搞错了，但不管怎样，土耳其文化中具有这种成分总还是事实。尽管拜占

廷成分也许不如想象的那样大，可是这类成分却有着比想象中还要深远而悠久的历史，甚至比拜占廷帝国的历史还更加久远一些。关于建筑物中还保留着拜占廷式的主题这一点，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但是一个社会中象宗教建筑物这样具有主要和典型意义的东西，决不可能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土耳其清真寺中的拜占廷成分既然表现得如此具有普遍性和持久性，特别是在一个处处打着宗教旗帜的伊斯兰社会里，那就必然有它更深的社会和文化的根源。这里只提出一条可供思考的线索：人们也许可以由这些圆屋顶和长方庙堂式的清真寺而联想到，在伊斯兰教中和在土耳其人的统治下，当初第一次出现了一个教权阶级，它由各教区首席法典官组成，是以谢伊赫·于尔·伊斯兰(Seyh-ül-Islâm, 教长)，即京都总法典官为最高权威的，而这个教长可以说——尽管听来也许有些离奇——就好比是奥斯曼帝国的大主教。这里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无论是大主教或者圆屋顶，甚至对于拜占廷来说，也都是来自东方的。

在这里，也许还可以考虑到另外一种地方性的影响。鲁米利亚和君士坦丁堡全都是欧洲的一部分，而奥斯曼帝国人民从他们早期历史时代起，就已经和欧洲发生了接触，这种接触，不论从年代上或者从亲密程度上来说，都是任何地方甚至包括北非在内的其它伊斯兰国家所不及的。奥斯曼帝国包括一些重要的欧洲地区，它在这些地区还把欧洲民族和各种欧洲制度都一并吸收了进来。另外，它还通过贸易、外交、战争以及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移民等方式，和西方保持着接触。

苏丹“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通晓希腊文，并保有希腊文的藏书。在他的近臣中，有意大利的人文学家安科纳人契里亚科·皮齐科利，有为他作传记的希腊人克里托博洛斯，也有为他画像的威尼斯人贝利尼。^⑦ 尽管这种情况是少有的，但也不是孤立的现象。